

生活在北京的巨华赤子

沈小红：《归国五十年的回顾》（一）



2017年7月28日，是我们姐弟俩回国整整50周年，为了更好的纪念这个日子，现将50年前前后的记忆碎片一点点拼接整理出来，在巨华北京校友成立30周年纪念刊物上记录一下我们归国50年来的风雨历程。请前辈们赐教。

——回国前

1958年12月22日，我出生在印尼巨港，父亲沈慧争、母亲黄雯雯。我是老大，排行第二的是小我两岁的弟弟。父母为我们分别起名为沈小红、沈小专，其用意是希望将来成为又红又专的有用人才，为祖国做贡献。回想起来这也许是老天安排好的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，只有我们姐弟（又红又专）回国至

今。

爸爸在印尼是华校教师，1950年起一直在巨港任教。1962年我们从巨港搬到楠榜，爸爸在那里教书，我开始上幼儿园，弟弟还小。我们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教师宿舍，有许多老师就住在我家周围，经常会哄我们玩。上幼儿园时，我留着长发，每天都要妈妈给梳辫子，很耽误时间。家门前就是幼儿园玩耍的地方，有滑梯，有跷跷板，我们姐弟还在这个地方照过相，至今印象深刻。

后来我们又搬到雅加达，在快乐世界篮球场附近的一个房间里，我们一家住了下来，那时已经有了我们的妹妹老三。家门前有一个比较宽敞

的地方，妹妹会在那里推着学走路的车走来走去，还装了一个摇篮，可以哄妹妹睡觉。我记得我在振强学校上小学，每次回家都要经过游乐场和篮球场。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，我们一家又搬到galei，这是我们回国前住的地方，印象比较深刻。这里也是教师宿舍，有很长的廊道，廊道隔壁是印染厂，我们常常在这里玩。我读三年级时开始读印尼文，课文很深，对于我来说好难啊，天天背课文都背不会，觉得自己很笨。弟弟上幼儿园，开始学习中文，他聪明伶俐，常常会为一个字和爸爸发生争执，认为老师教的是对的，爸爸说的不对。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，导致印尼时局发生变化，顿时学校的师生开始紧张起来。有一天晚上，因为停电家里点着蜡烛（那时常常停电），我们兄弟姐妹躺在床上，爸爸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讲，学校全部关闭，我们不能进学校上课了，只能在家里由爸爸来为我们补习中文。那时，我们听到的是不允许有中文书籍，不准唱中文歌，不许听中国广播电台，一旦被发现有去坐牢，每天都心惊胆跳，不得安宁。

在学校被封闭的

日子里，爸爸除了教我们中文外，他还偷偷地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，让我们听小喇叭广播。在听之前，都要把屋里屋外的门窗关好，声音放的很小，生怕传出去有危险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爸爸与中国大使馆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带我们姐弟俩去中国大使馆，我们感到大使馆是那样的亲切，没有害怕的感觉，很喜欢，从那以后爸爸要是去大使馆我们就会吵着要跟去。爸爸为了鼓励我们学习中文，他让我们每天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和“老三篇”，并有目标要求，背会了才能去大使馆，还让我们在大使馆工作人员面前背诵，那时的我们一个7岁，一个5岁。也许

就是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们懵懵懂懂地知晓了中国，感觉到我们的家应该在中国。爸爸妈妈可能早有让我们回国读书的想法，不想让我们继续荒废时间。有一天爸妈对我们说，把你们送到中国去念书好不好？那时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一切听爸妈的安排。爸妈希望我们能回中国读书，又担心我们小小年纪生活不能自理，一百个不放心。爸妈说让我们姐弟先回国，等妹妹长大些他们再回去团聚，我们以为不久的将来全家人就能够团聚。爸爸让奶奶先带我们两个回中国，并把我们的托付给在北京的姑姑（那时我的二姑和四叔、五叔已经回国，二姑在北京工作，四叔、五叔还在暨南大学读书）。



1967年回国前的全家福：奶奶、双亲及四姐弟合影